

毛泽东



蒋介石

民国春秋丛书
MIN GUO CHUN QIU
CONG SHU

江苏古籍出版社

徐矛 石源华 编著

国共合作史话

为护法孙中山两度受挫
倡合作共产党西湖决策

开“一大”改组国民党 办“黄埔”建立革命军

争迁都蒋介石祸心毕露 举屠刀四一二血洗江南

西安事变实现政局大转变

七七战火促成国共重携手

K265.19
13

98915

民国春秋丛书

国共合作史话

徐 矛 石源华 编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OK92/32

国 共 合 作 史 话

编 著 者:徐 矛 石源华

责任编辑:王春南

出 版:江苏古籍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发 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电脑排版:江苏图片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南京江宁县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25 插页 1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113500 印数:1—6000 册

ISBN 7-80519-819-5/K·404

定 价:6.3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	第一回	为护法孙中山两度受挫 倡合作共产党西湖决策
9	第二回	开“一大”改组国民党 办“黄埔”建立革命军
19	第三回	工农兵奋勇平叛风卷残叶 学生军胜利东征初振军威
27	第四回	中山北上促国民会议运动 统一战线掀全国反帝浪潮
35	第五回	闹分共邓泽如领衔 遭暗算廖仲恺饮血
42	第六回	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 中山舰事件暴露蒋介石
50	第七回	北伐出师席卷大江南北 国民奋起收回汉浔租界
58	第八回	争迁都蒋介石祸心毕露 举屠刀四一二血洗江南
66	第九回	齐讨蒋三省革命继续高涨 向右转武汉政府压制民众

72	第十回	陈独秀交出领导权 汪精卫走上叛变路
81	第十一回	西安事变实现政局大转变 七七战火促成国共重携手
91	第十二回	两党军队山西抗敌 各方代表武汉协商
99	第十三回	正面战场丢城失地 敌后战场连战皆捷
106	第十四回	国统区弥漫妥协反共空气 解放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
115	第十五回	皖南事变危及国共合作 大局为重维护统一战线
124	第十六回	顽固派惊破反共梦 民主派支持共产党
132	第十七回	国共谈判断断续续 美使“调解”真真假假
140	第十八回	为和平毛泽东亲临重庆 要内战蒋介石撕毁协议
149	第十九回	四项协议露出和平曙光 中原“围剿”揭开内战序幕
157	第二十回	擅开“国民大会”谈判归破裂 拒签“北平和约”海峡成鸿沟
165	尾 声	

第一回 为护法孙中山两度受挫 倡合作共产党西湖决策

公元1922年6月16日凌晨,寂静的广州夜空突然火光冲天,密集的枪炮声夹杂着“炮轰孙文!”“打倒孙大炮!”的叫喊。“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孙中山一手扶植起来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派兵包围总统府,炮击孙中山的住处观音山粤秀楼,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在枪林弹雨中仓促脱险,到停泊在白鹅潭的楚豫舰上避难。翌日,宋庆龄也化装来到黄埔与孙中山会合,两人转登吨位较大的永丰舰。孙中山在军舰上指挥海军和部分陆军反击陈炯明叛军,坚持50多天,终于未能挽回局势,于8月9日离开广东前往上海。在孙中山坎坷的革命征途上,这是他遭受的最为严重的一次失败。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在就任中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3个月内,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30多件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商业发展的法

律、法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压迫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妥协退让，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孙中山虽辞去临时大总统，但毫不气馁，继续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而努力奋斗。他领导和参加了著名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

1917年夏，当北洋军阀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废弃《临时约法》和“旧国会”时，孙中山在上海毅然举起护法的旗帜，反对毁法横行的军阀独裁统治。7月，他同部分国会议员率领起义的海军第一舰队从上海去广州。8月25日，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建立了与北洋政府相对立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表示要“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责，雪数岁无功之耻”。但由于他没有自己的军队，只能依靠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滇系军阀唐继尧。陆、唐之所以附和“护法”，仅仅是为了利用孙中山的威望，来对抗段祺瑞，保护并扩展自己占据的地盘。他们勾结议员中的政学系政客，排斥孙中山，甚至不顾孙中山的坚决反对，擅自与直系军阀妥协，通电主和。次年4月，他们操纵非常国会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改大元帅首领制为七总裁合议制，把孙中山从大元帅降为7个“政务总裁”之一，推老官僚岑春煊为主席总裁，置孙中山于无权的地位。孙中山怒斥南北军阀为“一丘之貉”，并指出“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然而对于这些军阀，却无力反击。5月4日，他愤而辞职，离粤赴沪，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

为了继续“护法”，孙中山决定首先打垮桂系军阀，夺回广东。他把希望寄托在粤军首领陈炯明身上。陈炯明，清末秀才。

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曾参加过 1911 年的广州起义。1917 年，孙中山将广东前省长公署的 20 营警卫军交给陈炯明，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粤军。孙中山全力培植这支军队，在经费最困难的时候，甚至将自己在上海的房子拿去抵押，筹款以供粤军使用。1920 年 8 月，孙中山利用各方反桂的形势，命令在福建的粤军打回广东，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取得了胜利。广东军民欢迎孙中山回粤。11 月 28 日，孙中山抵达广州，重组军政府，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1921 年 4 月，非常国会决定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7 月，他出兵平定广西，统一了两广。12 月，在广西桂林建立北伐大本营，准备乘胜出师北伐，进攻直系军阀，以“完护法之愿”。但身兼陆军部长、内务部长、广东省长及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却与英帝国主义及直系军阀相勾结，反对北伐。先是暗中牵制，迫使孙中山于次年 4 月回师广东，改在韶关设立大本营，准备由广东直下江西南昌；接着，陈炯明又悍然发动了本文开头所叙述的武装叛乱，企图谋害从韶关前线回到广州的孙中山。

孙中山再次避走上海，为陈炯明的叛变深感痛心。他在《致国民党员书》中说，他为民国奋斗，达 30 年，中间出生入死，胜败之数不可屈指，而“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历次失败都败于敌人，但这次则是“敌人已为吾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 10 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不惜。此不但民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悲痛之余，他开始认识到过去利用一个军阀去打倒另一个军阀的旧办法是行不通了，但新的道路在哪里呢？孑然无助的孙中山，迫切需要支持和帮助。

孙中山曾先后向日、美、英、法等国求援，希望它们能同情

和援助中国革命。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在离粤去沪途中，曾绕道日本，希望能得到日本政府的援助，结果却发现“日本当局，仍决心助段（祺瑞），遽欲其改变方针，事恐大难”，“只得匆匆归沪”。接着，孙中山又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请求支持，而威尔逊竟表示：“不愿与孙中山直接通信”，将电文批交国务卿兰森处理，而兰森则根本怀疑孙中山“对中国目前将再有任何真正影响力”。1921年底，华盛顿会议在美国召开，尽管孙中山再三要求南方军政府派代表出席，却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孙中山所作的种种努力一一付诸东流。就在这时，苏维埃俄国和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使他开始了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宁就热情洋溢地称颂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勇气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认为他提出的“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系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体系，阐明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原则。据此，列宁十分关注中国革命，十月革命后不久即与孙中山建立了书信联系，表示要互相支持，“共同进行斗争”。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郑重宣布：废除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将沙俄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建议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并缔结友好条约。共产国际建立后，更不断派出代表同孙中山联系，一方面帮助孙中山同苏俄结盟，一方面帮助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

在十月革命发生后，孙中山也一直关注着苏俄形势的发展。1918年7月，他致电列宁祝贺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收到贺电后十分高兴，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复函表示感谢。对于苏俄政府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孙中山曾经有过怀疑，但当苏俄政府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孙中山的疑虑便消除了。他将苏俄的十月革命与中国的辛亥革命作了比较，看到“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堕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他的目光开始转向苏俄，“以俄为师”逐步成为他的主要思想。1920年11月，他在上海会见了俄国共产党（布）远东局代表魏金斯基，要求与苏俄建立电台联系，并对把中国南方的斗争同苏俄的斗争结合起来抱有浓后的兴趣。1921年8月，他在广州给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写了一封长信，热切地表示：“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同年12月，他又在桂林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作了三次长谈，讨论苏俄承认南方政权以及中苏结成联盟的可能性。马林向孙中山建议：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工大众；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之基础；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这次会见增强了共产国际、苏俄政府与孙中山间的相互了解，对于孙中山决定未来的方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国民党人说，“这便是总理联俄的起点了”。1922年4月底至6月中旬，孙中山进而在广州与少年共产国际兼苏俄政府代表达林进行多次会谈，具体研讨苏俄与孙中山的关系以及国共实现合作的前景，有关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

与此同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

导下,根据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的学说,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不能单独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而必须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实行合作的政策。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提议邀请国民党等民主派及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反封建军阀的联合战线。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原则上确定了与国民党联合的方针。关于两党联合的具体形式,由于孙中山拒绝采用党外合作方式,马林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并专程赴莫斯科请示共产国际执委会,获得了批准。共产国际授权马林来华指导中国共产党实行这一方针。共产国际的这一决定就密写在马林的衬衣上。

8月,正是孙中山第二次护法失败到达上海后不久,马林再次从苏俄来到上海。根据他的提议,中共中央在当月下旬举行杭州西湖特别会议,5名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全部到会,马林、张太雷也出席了会议。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7月决定,并坚决主张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7月决定的决议,并决定中共少数负责人立即加入国民党。

西湖会议一结束,中国共产党立即着手进行两党合作的准备工作。8月23日,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会见孙中山,陈述“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孙中山听了非常兴奋,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孙中山对李大钊的

为人也极为赞赏，愿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说明他是第三国际党员，孙中山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于是，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李大钊第一个以共产党员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两天后，马林也在上海会见孙中山，介绍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的决定，并建议以上海为基地开展群众性宣传活动。不久，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张太雷等先后加入国民党。

从这以后，孙中山决心依靠共产党人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改组国民党。9月4日，他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会议，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53人参加了会议。孙中山即席解释了联俄联共政策，指定9人组成“国民党改组案起草委员会”，其中有共产党人陈独秀。为了推动国民党的革命化，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向导》周刊等对孙中山、国民党的一些错误进行善意的批评和劝告。马林用笔名撰文批评说，孙中山经常联合一部分军阀去反对另一部分军阀，结果往往是“昨天还是他的好朋友，今天能够翻脸，明天或成仇敌”。蔡和森也在文章中劝告孙中山应当一面与民众亲切结合，一面与苏俄结成“不二的同盟”，“大着胆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李大钊、张太雷等指出孙中山历来只偏重军事活动，忽视对民众的宣传和组织，这是辛亥革命以来12年奋斗一无所成的主要原因。这些金玉良言，帮助孙中山总结了经验教训，使两党对于国民革命的基本认识逐步接近，奠定了合作的思想基础。在共同的斗争中，孙中山和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建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

1923年1月初,孙中山在上海连续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国国民党总章》等重要文件,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紧接着,他又毅然采取联俄的公开行动。1月中旬,经李大钊、林伯渠联络介绍,孙中山在上海寓所与苏俄政府特使越飞进行会谈。李大钊、林伯渠也参加,接连谈了6天,进一步商讨了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与建军,以及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孙中山“极为喜悦”,曾吩咐侍卫无论何人都不予通传和不许登楼。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双方确认“当前中国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诚挚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托”等,从而宣告了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接着,为了避开帝国主义鹰犬的耳目,越飞以养病为名前往日本热海温泉,与孙中山的代表廖仲恺秘密进行了1个月的细节商谈。苏俄政府对孙中山的大力支持,坚定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决心。

正在这时,从广东传来了大好消息:陈炯明已被孙中山所组织的讨贼军(由许崇智的粤军、杨希闵的滇军、刘震寰的桂军等组成)所驱逐。2月,孙中山第三次到广州建立政权,重新成立大元帅府,再任海陆军大元帅。从此,国共两党合作的筹划就从上海移到广州进行,广州成了真正的国民革命中心。

第二回 开“一大”改组国民党 办“黄埔”建立革命军

在中国革命史上，1923年的初夏，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国共两党以争分夺秒的革命精神加速了合作的步伐。

2月，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流血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教育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使他们认识到：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同盟军，没有自己的武装，就无法在毫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战胜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从而大大增强了实现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迫切感。

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三大”。会议批评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关门主义倾向，张国焘等人认为共产党不应当与国民党合作，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革命，国民党是不能进行民主革命的，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经过热烈讨论，大会决议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为民主革命联盟，“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

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一决定表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前进了重要的一步。8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南京举行“二大”，作出了相应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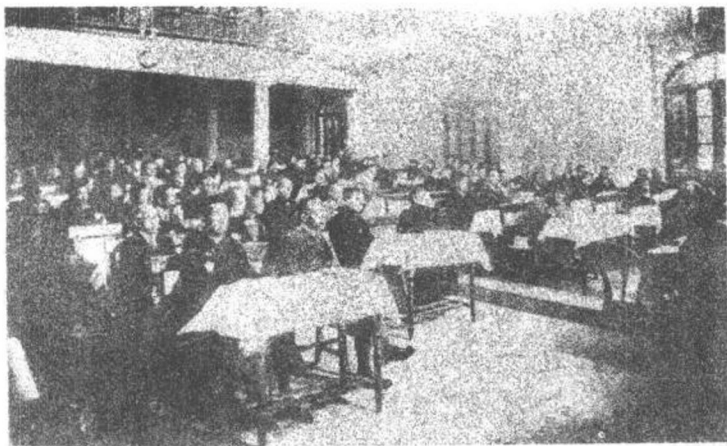
从这以后，在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动员组织下，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在各省积极建立国民党组织，并“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用国民党的名义组织和参加各种人民团体。在北京，李大钊主持了国民党整个北方的领导工作，建立起北京、天津市党部和直隶省党部；在长沙，何叔衡、夏曦等积极筹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上海，毛泽东、王荷波、向警予等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重要工作。此外，浙江的宣中华、江苏的侯绍裘等也都参加筹建了国民党省党部，并在其中担任常务委员。远在巴黎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领导人周恩来，也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不久，成立国民党旅欧支部，80余名团员全部加入国民党，周恩来当选为总务主任，李富春为宣传主任。大批新鲜血液注入国民党，使国民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气勃勃的局面。

孙中山也同样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节奏。8月26日，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有共产党员张太雷等参加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从上海启程，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10月5日，直系军阀曹锟以5000元1张选票购买议员，以40万元巨款收买国会议长，当上了大总统，全国舆论哗然，大规模的反直运动迅速掀起。孙中山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的同时，更急切地将联合苏联和改组国民党摆上了议事日程。10月6日，应孙中山邀

请，苏联顾问团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来到广州。苏联政府代表加拉罕致信孙中山，说“鲍罗廷为我党元老同志之一，曾长久致力于俄国革命运动，请不仅视鲍同志为官方代表，也视他作为我的私人代表，你同他谈话就如同我谈话一样，他说的话，亦如同我亲口向你说一样可靠”。孙中山读后十分高兴，立即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并在向国民党人宣布这一任命时说：“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鲍罗廷深得孙中山信任，他在按照苏联共产党（布）的经验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促使国共两党实行组织上的合作，鼓励国民党从事反帝斗争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0月1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戴季陶、张继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25日，在广州举行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谭平山、林森、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9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正式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并决定于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正当国共合作的筹备工作在着着推进时，一股反对国民党前进的暗流翻卷起来。11月29日，右派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在《国民党改组宣言》与《国民党章程草案》公布的同日，联名上书孙中山，指责这些文件“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示”，“谭平山出面任事，陈独秀则在暗中牵线，内里隐其阴谋”，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孙中山读信后批道：“此稿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文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并断然表



中国国民党“一大”会场

示：“你们愿意跟着我革命的就来，不愿意革命的就走；我不能勉强拉你们来革命，你们也不能勉强拉我不革命。”当右派顽固地坚持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时，孙中山愤而指出：“你们不同共产党合作，我就解散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由于孙中山旗帜鲜明，在他的周围很快团聚起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一批左派，他们和共产党人并肩战斗，帮助孙中山完成了国民党改组的准备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举行。这是国民党通过党内改组方式实行联共的大会。代表人数每省6人，其中3人由孙中山指定，另3人由各省党员推选。后来孙中山又临时加派了一些代表，所以有的省或特别区的代表人数超过6人。连同海外华侨的党员代表，孙中山特别指派的何香凝、陈璧君等3名女代表，以及列席的